

# 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纪玲妹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人文社会科学部,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 清代词学领域里,常州词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

**关键词** 毗陵词人群 毗陵四子 常州词派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3-0070-04

曲子词经过元、明的式微之后,于有清一代呈中兴之势。其中兴的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地域性词派、词人群体及大量优秀词作,其中尤以常州词派影响最为深远。早在清初,江南常州就出现了影响较大的毗陵词人群,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很好的词学氛围和环境。乡邦文化的熏陶,同乡先贤的影响,给嘉道年间兴盛的常州词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也有一定启发与影响作用。

## 一、清初毗陵词人群为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氛围

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之《广陵词坛和毗陵词人群》(常州古称毗陵、兰陵)中,对毗陵词人群的情况做了介绍,并对其中重要词家进行了精当的评述。在词学领域,常州词坛在清朝独树一帜。《国朝常州词录》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国朝词家推吾州为极盛”<sup>[1]</sup>。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邹祗谟字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顺治十五年(1658)与王士同榜进士。他早孚文名,其古文辞与陈维崧、董以宁、黄永并称“毗陵四子”。邹祗谟早年就与董以宁以艳词小令闻名,今存《丽农词》三卷,他与王士合编《倚声初集》,编录时人词话、论词杂文、韵辨等,录词家470余人,记录其姓名、字号、籍贯、仕履及词集名,是一部很重要的、具有文献价值的词学著作。王士《怀人绝句》这样写道“藉藉兰陵四才子,陈黄邹董各名家。难忘雪夜吴儿曲,檐角寒梅正作花。”描写了陈、黄、邹、董四人雪夜听

曲的风雅生活。陈维崧《任值斋词序》云“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二君独为之,放笔不休。”邹、董对振兴家乡常州的词学,甚至对清词中兴局面的开启,确实有不可抹杀的作用。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常州出现了一个词人群体,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表》中,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叙说:

余向序阮亭(王士)词云“同里诸子,好工小词,如文友之儇艳,其年之娇丽,云孙之雅逸,初子之清扬,无不尽东南之瑰宝。今则陈、董愈加绵渺,二黄益属深妍。更如庸庵之醇洁,风山之超爽,卓人之精腴,介眉之隽练,公阮之幽峭,紫曜之鲜圆,陶云之雅润,虞明之秀濯,含英咀华,彬彬可诵,词虽小道,读之亦觉风气日上。”<sup>[2] 359-660</sup>

以上提及的词人分别是:董以宁,字文友,著有《蓉渡词》三卷;陈维崧,字其年,阳羨词派的领袖,有《湖海楼词》;黄永,字云孙,号艾庵,有《溪南词》二卷;黄永之弟黄京,字初子,著有《续花庵词》;史树骏,字光庭,号庸庵;孙自式,字衣月,号风山,著《风山诗稿》;毛重倬,字卓人,号闾仙,阳羨词派著名词人,有《卓人集》;龚百药,字介眉,号琅霞,著《湘笙阁词》;毛羽宸,字公阮,有《碧栖堂稿》;钱,字紫曜,著《白雪斋词》;杨大鲲,字九转,一字陶云,号天池;陈玉,字虞明,号椒峰,有《烟耕词》三卷,又名《学文堂诗余》。

以上是邹祗谟对毗陵词人群的一次总体概评。除以上提及的,当时毗陵较有影响的词人还有董元恺,字舜民,号子康,有《苍梧词》;邵长蘅,字子湘,有《青门词》;杨大鹤,字九皋,一字芝田,有《稻香楼

词》董文骥，字玉虬，号云和，有《微泉阁词》；周清源，字浣初，有《浣初词》；章惟，字无恤，有《春柔词》等等。常州当时共辖八邑，被称为“八邑名都”，词人远不止这些，但仅此一斑，也足见常州词坛之盛。《国朝常州词录》卷一至卷五均录清初常州郡词人词作，卷一录毛重倬等25人99首词，卷二录董元恺等21人118首词，卷三录陈玉等18人86首词，卷四录陈维崧等10人111首词，卷五录陈维岱等34人93首词。五卷共录该郡词人108人，词作507首，足可见该郡词人群体声势之大，难怪严迪昌先生说：“常州之称词派，要迟至嘉庆年间始有旗号，然而清初词人密集于该郡的声势，远较后来要壮观得多。”<sup>[3]70</sup>

在当时“天下填词家尚少”的情况下，苏南常州涌现出了这样一个声势较大的词人群体，执着地耕耘于词学领域，对促进清词的繁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更为家乡常州提供了丰沃的词学土壤。这样的词学氛围，到张惠言时，已绵延180多年。任何人对家乡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家乡的文化也更加重视。常州自吴公子季札让国分封于此，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一个经济富庶，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文化人很自然会产生浓厚的乡邦意识和自豪感。既然清初涌现过这样一个较有影响的词人群体，家乡的后人肯定会关注他们的词作，并潜移默化受其影响。如常州词派重要人物陆继辂在《治秋馆词序》中就记载了他二十一岁开始学词，首先取同乡前辈的词研读，如陈维崧、邹祗谟的词，董以宁的《蓉渡词》等。其他词人也会像陆继辂一样，在学习乡里前辈们的基础上，走上词学创作道路。浓厚词学环境的浸润熏陶，有乡党先贤的启发影响，常州词派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

## 二、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

清初毗陵词人不仅为常州词派提供了良好的词学环境，而且乡党先贤的词学理论也势必会启发、影响后来者。常州词派推尊词体，以“意内言外”论词，重寄托等很重要的理论，均已为清初毗陵词人提及。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序言中作过这样的概述：

在昔先路之导，邹、董并称，以及玉、舜民、青门、椒峰、狎主敦，同音笙磬。顾矜语性灵，颇流率易，溺情闺阁，亦落猥琐，沿明季之余习，犹大雅所弗尚<sup>[1]</sup>。

序文中虽对清初“溺情闺阁”的词颇有微词，但并不否认其“先路之导”的作用。

邹祗谟虽然在词的创作上多侧艳之作，但在词学理论上，已开“尊体”先导。他在《远志斋词衷》中

提出“不以倚声为卑格”的观点，尊体之意十分明了。他认为词的侧艳与正道并不相背，他所编的《倚声初集》汇合众流，备陈诸体，取舍相当公允。邹氏在序言中云：“‘恼公’‘懊侬’之曲；‘金荃’‘兰畹’之编，其始源于‘采苕’‘弋雁’，其流浚于美人香草，言情之作，原非外篇。”在这里，邹氏提出“言情之作”源于“美人香草”，不仅为言情词争得一席之地，而且把言情的词与诗、骚联系起来，有尊体之意。在谈到“长调须一气流贯”这个问题时，邹氏“引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云：‘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与诗略有不同。’<sup>[2]350</sup>首先肯定诗词是“同一机杼”的，不存在谁尊谁卑的问题。

另外，此集的另一编者王士禛的一篇序言观点更明确：“诗之为功既穷，而声音之秘，势不可终废，于是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余而乐府之变也。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王氏为“诗余”二字找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词与乐府同出一源，是“诗之苗裔”，明显提高了词的地位。清初其他词人，如毛先舒、尤侗等在其词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词与诗同源，与诗并尊。

清初词风的嬗变，首先体现在“尊体”的观念上，绝对不是偶然的。清初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明清易代的血雨腥风，经历了文字狱、科场案、奏销案的残酷变故，汉族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久不为人重视的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词作为倾吐心声，发泄愤懑，抚慰心理创伤的工具。为词正名，意味着文人对这种文体的认可，既然词具有与诗同样的地位，那么词就应具有诗同样的功能：言志。

阳羨派、浙西派继续推尊词体，到了张惠言《词选序》，借许慎《说文解字》转引东汉孟喜《周易章句·系辞上传》之言，终于有了“意内言外”之论，成为该派的主要词论之一。

但实际上，以“意内言外”论词，也并非始于张惠言，而是在清初毗陵词人中早已有之。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中就曾指出：“阮亭常为予言，词至云间幽兰、湘真诸集，意内言外，已无遗议。”<sup>[2]351</sup>由此可见，以“意内言外”论词，张惠言也是继承了同乡先贤的论词观点，而发展成一家之言的。张惠言又云：“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sup>[4]617</sup>他立足于儒家的正统观念，认为词与诗出之同源，与《风》、《骚》相近，应“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sup>[4]618</sup>，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词为艳科”、“小道”的观念，使词体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惠言侧重于提高词的立意与格调，认为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里巷男女哀乐，

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sup>〔4〕</sup><sup>1617</sup>以含蓄、曲折委婉的方式,反映文人雅士感士不遇等感情,这完全与诗、骚的香草美人是一个路子。

董元恺是清初毗陵词人群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苍梧词》12卷,存词近700首。董元恺是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次年即遭“奏销案”被罢黜。尤侗在《苍梧词序》中说:

故以抑塞磊落之才,使飞扬跋扈之气,以崎窈窕之遇,抒缠绵凄怆之怀。其为词也,或取诸骚焉,或取诸子焉,或取诸史焉,或取诸赋与诗焉,或取诸书与画焉,无不有也,无不似也,岂非哀乐过人,一往而情深者乎?

这篇序言说明董词取之于诗、骚、子、史,立意较高,其“以崎窈窕之遇,抒缠绵凄怆之怀”,也与张惠言的“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相似。毗陵词人群的创作虽受明词的影响,有一定的侧艳之风,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全部。邹祗谟的《最高楼·丁亥答文友楚中寄词》抒发莫名的惆怅,《满江红·己丑感怀》更是壮怀激烈,言词悲怆,董以宁的小令《望梅花》别具狂狷之意,黄永的词,中年以后由俏丽转为清劲峭拔,透郁勃之气。董元恺的咏古词,如《多丽·北邙山感怀》、《念奴娇·乌江怀古用东坡赤壁韵》、《永遇乐·过虎牢关用辛稼轩韵》等,严迪昌先生评曰:“流连感喟于历史陈迹前,反思昔往今来,体察人生的诸般辛辣。这些怀古之作都有一定的感情厚度,并且气势雄沉,读时令人惊悚。”<sup>〔3〕</sup><sup>178</sup>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中提到“今则陈、董愈加绵渺”,也说明他们的创作由艳情向曲折绵渺转变。

在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群已有求雅化、含蓄、寄托的倾向。清初词人求含蓄是对明词的反拨。与提倡“神韵”诗论的王士禛交往密切的邹祗谟,也以含蓄论词,在评云间词时说:“子山江枫一集,力删透露。其年咏枕诸篇,更饶含蕴。情景兼得,吾何间然。”<sup>〔2〕</sup><sup>151</sup>求词的意蕴含蓄,是为“寄托”说作铺垫的。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论词著称,这也是继承了清初毗陵词人词学主张的。毗陵词人陈玉(椒峰)有《烟耕词》三卷,徐竹逸这样评论其词:“椒峰兹集寄托遥深,体裁宏丽”<sup>〔1〕</sup>。邹祗谟论“咏古词须有寄托”云:

词至咏古,非惟著不得宋诗腐论,并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复流连,别有寄托,如杨文公读义山“珠箔轻明”一绝句,能得其措辞寓意处,便令人感慨不已。<sup>〔2〕</sup><sup>153</sup>

咏古诗词的特点是,不空发议论,借历史事件抒发真实感情。虽然邹氏特指咏古题材,虽然这里的

寄托也许还比较单纯,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并影响后来的常州词派。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比兴”说,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寄托说”。他指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sup>〔5〕</sup>。“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sup>〔6〕</sup>。这些理论是在清初毗陵词人含蓄、寄托论词倾向上的进一步发展。

重学也是常州词派的重要特点之一,但重学的传统在清初毗陵词人中已见端倪。邹祗谟博学多才,毛先舒为邹氏《丽农词》写的序言可证明这点:

虽然,余谓皆士(邹祗谟)之学为之耳。盖士负宏博才,其于文章真能穷源极流者也,所著《文抄》经术史学,条贯纷纶,而便便出之,如云属河注。故虽作一词,皆有大气精思,贯其表里,而足以益人性情如此。且士射策中、甲科中,更不得意,其缠绵悱恻之思,不能不于词发之,而又必本太史公所称《国风》、《小雅》以为托始,独难为拘墟者道耳。

这是清词重学的先声。这篇序言,已经意识到了词人的学识,是写出好词的基础和重要条件。邹祗谟“负宏博才”,精通经术史学,所以在他的词中,虽不刻意为之,却能“大气精思,贯其表里”,表现出深厚的底蕴。而且从这里我们也可知,邹氏在词中也曲折抒发其怀才不遇的失意之情,并有所寄托。另外,董以宁亦有“才子”之称,于历象、舆地、乐律均有专精,尤其致力于《经》、《易》,穷究虞氏《易》多有成就。陈玉“少有大志,于天文、地理、兵刑、礼乐、河渠、赋役等,莫不精通,撰史论数百卷。黄永、孙自式、杨大鲲、杨大鹤等,均为进士,有很深的学术功底。常州人才辈出,有很好的做学问的风气,清初词人的重学,也会影响同乡后代。

常州词派对学力的推崇尤其突出,谭献《复堂词话》称:“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张惠言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张氏出生于世代业儒的贫寒之家,尊敬同乡前辈庄存与并受其影响,与庄存与的外甥刘逢禄来往甚密,共同研究虞氏《易》。常州派其他词人如张琦、恽敬、李兆洛、周济等,均有深厚的学力。这与常州地区的学术氛围,同乡先辈的影响不无关联。

### 三、毗陵词人群尊《花间》为正宗,张惠言特别推崇温庭筠,可谓一脉相承

清初词坛继明词遗风,艳体流行。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曾提到:“己丑庚寅间(顺治六、七年),常与文友(董以宁)取唐人尊前集、花间集,花庵词选及六十家词,摹仿偏调将遍。”<sup>〔2〕</sup><sup>143</sup>黄周星(九烟)曾这样

说：“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sup>[7]</sup>。邹、董二人及当时毗陵词坛多作艳情词，尤以董以宁为甚。其《蓉渡词》素以香艳著称。如《苏幕遮·帘外听堕钗声》等十阕、《沁园春》咏美人七阕，极尽香艳软媚之能事。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评价其词为“儇艳”。王士禛称他为“艳情中绘风手”，陈廷焯称之为“词妖”。与董以宁志同道合的邹祗谟对董以宁及清初词坛的香艳词风并不反对，甚至表示肯定。他自己也有闺阁艳词《丽农词》中有《惜分飞·本意》等多首艳词。谢章铤认为“邹程村与阮亭、羨门游，故其词修洁，有《花间》遗意”。与邹、董“同音笙磬”的董文翼、董元恺、邵长蘅和陈玉璠等人，也多“溺情闺阁”的艳词。

毗陵词人虽然创作了一些艳情词，但在理论上他们认为“言情之作”源于“美人香草”，并有求雅、求含蓄、求有寄托的倾向。王士禛在《倚声初集》序言中谈到其命名时说：

书成，邹子命曰《倚声》。陆游有言：“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会有倚声作词者，颇能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厥义盖取诸此。后之作者将由声音之微以进求夫六义之正变。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词集名由邹祗谟所定，命名的由来引用了陆游论《花间》之语，以示他们尊《花间》为正宗，反对浅薄，提倡含蓄论词。但“后之作者将由声音之微以进求夫六义之正变”又“颇有走出《花间》向传统诗学寻求回归的意味”<sup>[8]</sup>。

常州词派虽然在创作上摒弃香艳软媚，力主“微言大义”，这一方面是对清初毗陵词人的艳情词的反思，另一方面，常州词派理论上却又依托于“花间”，承认词“缘情”的体性，主张通过歌唱“里巷男女哀乐”来传达“贤人君子”的情怀。词为艳科，本来多

写男女之情，张氏是要从“微言大义”上去解释这些男女之情。《词选》中温庭筠词被收最多，张惠言推崇温庭筠为“最高”，称其词“深美闳约”，从温词中读出“感士不遇”、“离骚初服之意”，认为冯延巳《蝶恋花》“忠爱缠绵，宛然辨骚”。对这些词的评价与赞美，与毗陵词人群以《花间》为正宗，尊花间传统似乎是一脉相承的。“花间词笔”以委婉的语言表达真挚感情，不直露，具有了深微幽隐的潜能，所以张氏才能从中找出“微言大义”，以后的况周颐更是认为《花间》词“大且重”。

清初毗陵词人群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与嘉庆年间兴起的常州词派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常州词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毗陵词人群有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 [1] 缪荃孙. 国朝常州词录序 [M]. 江阴：缪氏，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云自在龛刊本。
- [2] 邹祗谟. 远志斋词衷 [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 严迪昌. 清词史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4] 张惠言. 词选序 [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周济. 宋四家词选序 [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1643.
- [6] 周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 [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1630.
- [7] 沈雄. 古今词话 [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1610.
- [8] 蒋哲伦，傅蓉蓉. 中国诗学史·词学卷 [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216.

##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订启事

(邮发代号 28-63, CN32-1117/TV, ISSN1000-1980, 双月刊)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为重点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登本校在水资源、水文、地质、测量、水利工程、水电工程、水运工程、海洋及海岸工程、水工结构、工程力学、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岩土工程、计算机科学、电力工程、电子技术及自动化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管理工程、水利经济、环境工程、机械工程等学科方面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学术讨论、研究动态等学术性文章，可供上述有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本刊创办于1957年，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在国内工程技术界和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刊载的文章中，有不少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和各种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部分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水利、水电、水运工程及其他有关工程建设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提供了科学理论、方法和具体建议，发挥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深受工程界和科技界赞许，并获得首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以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江苏省优秀期刊、全国水利系统优秀期刊称号。本刊每逢单月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定价12.00元，全年6期共72.00元。欢迎广大读者通过全国各地邮局订阅或直接与编辑部联系。编辑部地址：210098 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联系电话：025-83786343。